

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

林麗月

一、前言

明代嘉靖年間，北有韃靼寇擾邊境，南有倭寇劫掠沿海，「南倭北虜」，交相爲患。韃靼在嘉靖後期的二十餘年，幾乎年年犯邊，直至穆宗隆慶五年（一五七二），詔封俺答爲順義王，授其兄弟子侄軍職，並於沿邊開放馬市，西北邊境才告平靜，自此烽火不驚者二十餘年。倭寇問題則起於元末明初，盛於嘉靖中葉，至隆、萬之際，始次第剷平，東南數省飽受寇掠，明廷所投注之兵力與物力，殆不下於對付北虜。唯嘉靖後期沿海寇亂大抵皆中國之人爲之（註一），「動以倭寇爲名，其實真倭無幾」（註二），因此倭寇問題實不宜以純粹之外患視之，其與明代後期沿海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關係極爲密切，值得注意。

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貧瘠，是一個在地理條件上傳統農業經濟欠佳的省份，因此在明代的海禁政策下，閩人冒險出海貿易者，仍不在少數。嘉靖年間，更有中小商人勾結倭人，寇掠沿海，由海商演變成海盜，官方治倭患，以海上走私貿易的盛行爲其致亂之源，對福建沿海「奸民」之唯利是視，置朝廷禁令於不顧，每多所指責。然而閩人海上走私貿易的高度發展，若完全歸咎於沿海居民的罔顧法令，則甚不公允，因爲福建中小商人每引豪紳之家爲奧援，以掩護其非法貿易活動，敢於向朝廷禁令公然挑戰者，實際上是閩南一些有錢有勢的士紳，這些財大勢高的官宦之家，時人或稱之爲「勢家」、「勢豪」，或稱之爲「貴家」。本文的目的在就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閩南士紳與海上走私貿易之關係，試析閩南社會對海上貿易的反應與態度，閩南勢家參與走私貿易之情形，及右副都御史朱執治倭失敗之癥結等問題，以見明季閩南社會經濟特色之一斑。至於嘉靖以後之發展，則僅就其與本時期之變遷相關者略加論述，有關隆慶、萬曆年間海上貿易問題之詳細討論，將俟之來日。

二、洪武嘉靖間海上走私貿易的發展

洪武初年，沿海地區時有倭寇騷擾，濱海之民且與日人相結，聯合寇掠，致東南一帶，海警頻傳。太祖曾數度遣使赴日，欲透過外交途徑使日本政府制止倭寇，惜皆失敗，太祖以日本政府不能禁倭，遂與日斷絕外交關係（註三）。時天下初定，國內統治基礎尚未穩固，蒙古的殘餘勢力，仍在北方構成重大威脅，明廷尚無餘力出兵重懲海寇，於是採取消極防堵政策，於沿海各地廣置衛所城寨，並頒禁海之令，嚴禁國人在海上活動，違禁下海者處以絞刑，因而走泄軍情者處斬，人民知而故縱者，與犯者同罪（註四）。

在明代海禁政策下，海外諸國與中國通商，必須透過政治上的宗藩關係，由明廷頒給勘合憑信，在朝貢的名義與市舶司的監督下，進行貿易。明代市舶司初設於太倉的黃渡（今江蘇崑山、嘉定間），尋以商情狡黠，又地近京師，遂罷之。後於寧波、泉州、廣州分設市舶司，負責貢舶來華貿易之事，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南洋諸國。洪武七年（一三七四），以倭寇猖獗及番商假冒貢使行詐，盡罷之。（註五）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詔復廣州、泉州、寧波三市舶司，各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分隸廣東、福建、浙江布政司。各國必須由指定港口出入，且來有定期，舟有定數，不許違制；貢舶所帶貨物，除貢品外，其餘經明廷抽分收買後，方准在港口市舶司或京師會同館，於官員監視下與中國商民開市交易（註六）。貢品則由明廷以回賜方式，酬以相當貨值，此外任何私人貿易，概行禁止，是為「朝貢貿易制度」（註七），又稱「貢舶貿易制度」。此一制度將商業活動與外交關係結合為一，藉以統制番舶貿易，並防私商與海盜混入，保障海防安全，是明代對外馭邊政策之一環（註八）。

在朝貢貿易制度下，持有勘合的藩國雖可與中國貿易，但以貢約所限，或三年一貢，或十年一貢，無法自由往返互市，至於一般番商以不能取得勘合，依法概不准入境貿易。中國商民方面，由於市舶司與會同館開市時，所餘貨物量少質劣，亦難滿足其需要。故明初以來，貢使與中外商人往往互相勾結，越關冒禁，進行秘密貿易。

永樂、宣德年間，由於明廷經營南洋的影響，中外貨物的交流，及鄭和等通航南洋的成功，一方面刺激中外商人往來逐利的心理，同時亦常來了航海的安全與方便；加以永樂初年，中日訂立貢約，允許日本通貢互市，倭患漸少，沿海警備亦以承平日久，漸趨鬆弛，故永樂、宣德以後，走私之風，日甚一日（註九）。嘉靖二年（一五二三），給事中夏言上奏以倭患起於市舶，遂

罷之（註一〇）。市舶罷後，沿海走私貿易更盛，利權在下，海禁爲之廢弛。

走私貿易發展至嘉靖年間，規模組織已與以前不同，據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指出：嘉靖以前，冒禁下海者多爲海商及迫於生計的濱海小民，豪門貴家參加者既少，亦尚不敢公然出入。嘉靖以後，走私商人分爲兩種：一是由閩浙大姓貴家操持主使，私梟船主與勢要土豪結合的上層勢力，挾制官府，包庇窩藏，公然進出海上；一是沿海貧民與桀驁者結船行販的下層勢力，急迫時亦往往賄投勢家以爲掩護。（註一一）此所謂「勢家」、「貴家」、「大姓」者，或爲在職的官宦之家，或爲致仕的鄉紳之家，財富與權勢兼而有之，濱海商民與其結託，初則勢家窩藏私貨，掩護走私，以坐索重賄，繼而操持兩端，要脅私商，常負債不償，海商憤其騙勒，乃寇掠其家以報復之，海上走私貿易遂演變爲沿海寇亂（註一二）。因此嘉靖年間，海上走私貿易日盛之際，亦是閩浙沿海「倭寇」問題昇高之時。

三、閩南社會對海上貿易的反應

嘉靖年間，沿海各省違禁出海貿易者，以閩、浙之人最多，而福建以經濟社會環境特殊，謀生不易，濱海人民對海上貿易的倚賴日深，致閩省走私貿易之盛，更甚於浙江。

明代中葉以後，福建濱海地區對海上貿易活動反應熱烈，態度積極，與傳統農村社會的保守習性迥然不同。此與福建的自然地理環境及社會經濟變遷均有密切關係。就地理環境言，福建沿海山多田少，土地貧瘠，「地多岡阜林麓，難以海鹽斥鹵，溪澗流潦，決塞靡常。其稱沃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註一三）除魚蝦之利稍稱豐饒外，所出率不足以自給，食米方面，閩南多賴廣東惠州、潮州輸入，閩北多仰給於浙江溫州（註一四）。絲縷棉絮之產，則多仰資吳、浙。（註一五）泉州府志所稱「資食於海外，資衣於吳越，資器用於交廣」（註一六），實亦閩省沿海各地土瘠物薄不能自給的共同寫照。

福建可耕之田既少，又多爲勢豪與寺院所兼併侵奪，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明季閩省大姓競相置田，與江南大賈「強半無田」的風氣不同，此緣福建田賦較輕，而米價亦貴賤適中，蓄田之利較大之故。據閩人謝肇淛指出：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蓄田，貪官勢族，有畛隄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寇之，黃雲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矣。」（註一七）

勢豪大姓之外，寺院占田之廣亦足以病民。福建境內，僧田有多至萬畝者，而當差良民，或無寸土，照丁徵餉，苦不堪言，更有僧人以田投獻勢豪之家，謀爲住持（註一八），於是僧田的增加愈益助長大姓之勢，貧富不均的現象因此更爲嚴重。中葉以後，此種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環境，成爲福建人民突破傳統自足經濟的內在力量。十六世紀上半葉，閩南沿海一帶，以海爲生的人口已多於耕田爲生的農業人口，以泉州爲例，兩者比例約爲六比四（註一九）。同時，閩人的商業活動區域則在不斷擴大，至嘉靖初年，其交易範圍已深入偏遠的內地，不再侷限於沿海城市，謝肇淛稱：

「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眞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尙什五遊食於外。」（註二〇）

「山到崔嵬盡力耕」，此爲自然條件惡劣的福建小農所做的努力，而無田可耕與地瘠不能耕之人，便只有突破傳統經濟，出外謀生。

另一方面，明代中葉以後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也導致福建農村社會的轉變，茲略論如后：

其一、最顯著的一項變化是商品經濟的發達。明朝中葉以後，區域間的貿易已不再限於奢侈品的交易，而漸以一般消費品的流通爲主，因此各種經濟作物的栽培與手工業產品的貿易大爲推廣（註二一）。福建因稻米產量不足所需，而人口壓力與日俱增，故經濟作物之栽培較爲發達，芋麻、藍靛、煙草、甘蔗之專業生產，在閩省極爲普遍（註二二）這些經濟作物的栽培，不在供應農家本身之所需，而是以交通有無貿遷圖利爲目的，故其商品性質極爲顯著。同時，果樹的栽培亦極爲發達，以荔枝、龍眼、柑橘爲大宗，福州、興化、泉州、漳州等府均盛產之（註二三）。其餘如橄欖，香蕉等果物的生產，亦皆以買賣爲目的（註二四）。

其二是貨幣經濟的發達。明代中葉，白銀已普遍用爲貨幣，代替洪武初年發行的大明寶鈔在市場上流通（註二五）。福建境內，除白銀外，尚有宋幣、西班牙銀元等貨幣用於民間交易（註二六），貨幣經濟的發達遂使商業活動愈爲蓬勃。

閩南人一方面受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不得不突破傳統農業經濟另謀生路，另一方面在前述明代中葉以後經濟變遷的氛圍中，愈益激發其爭逐商業利益的心理，「貿易取向」（trade-orientation）極高，遂成閩南社會的一大特色。（註二七）加上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的出現，沿海貿易的機會大增，閩南人民於是紛與番夷貢舶交通接引，迎販私貨，反應極爲迅速而熱烈。

嘉靖年間，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曾指出，其時沿海之民通番互市者，福建漳州、泉州、福州三府之人居十之九（註二八），而據右副都御史朱軫稱，漳、泉之人私販海上者，尤盛於沿海各地（註二九）。宋室南渡後，海上交通發達，泉州是當時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商旅雲集，百業繁盛，至元代而達於極點，地位超過廣州成爲對外貿易的最大港口。迨明朝於泉州設市舶司，貢使外商仍往來不絕，明初泉州的繁榮正是貢舶貿易興盛的象徵。永樂、宣德年間，濱海之民投身海上貿易者漸多，民間貿易活動轉趨蓬勃，泉州在海上貿易的獨占地位亦因此受到威脅，沿海各地民間的「商舶」，漸有凌駕官方的「市舶」之勢。前往廣州的貢舶與番商爲逃避明廷課稅，便與閩人勾結，由閩人引導番船改泊於漳州之海倉、月港，私與閩南人民貿易（註三〇）。其中月港因得海道交通之便，閩南商民多由此地私自出洋，前往呂宋等地貿易，成化、弘治之際，月港因走私貿易的興盛，市況繁榮，已有「小蘇杭」之稱，據海澄縣志載：

「富家以財，貧人以驅，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輕生，鼓柁相續，亦既習慣，謂生涯無險此耳。……成、弘之際，稱『小蘇杭』者，非月港乎？」（註三一）

在明代海禁期間，漳州月港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大事。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於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抵廣州，不斷在沿海各省要求互市，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市舶司由高州電白縣移至據鏡（今澳門），葡萄牙人更乘機混入，於其地購屋置產，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至據鏡與其貿易，趨之若鶩。（註三二）葡人更由粵至閩，停留於漳州，於嶠嶼建立根據地，私與國人進行貿易，與地方人士關係極爲良好，（註三三）重利所在，人樂趨之，這就無怪乎漳州之民「以業文爲不貴，以船海爲恆產」（註三四）、喜波濤而輕生死了。嘉靖以後，隨著沿海走私

貿易規模之擴大，漳州月港的民間貿易更加繁盛，終於一躍而為閩南大鎮，成為沿海走私貿易的中心。

至於明代勢家大姓之從事海上貿易，則早自成化年間已有之，據張燮東西洋考載：

「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者。奸人陰開其利權，漸享其贏，……至嘉靖而弊極矣。」（註三五）唯嘉靖以前，士紳之投入海上貿易者，為數較少，不若嘉靖以後勢家操持主使，公然犯禁之普遍。此種現象，尤多見於閩、浙沿海。閩南方面，由於貧富不均日趨嚴重，加以遠處邊隅，中央政治勢力不易深入，因此地方士紳豪門的勢力更為強大（註三六）。彼等憑藉優越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對「利可十倍」的海上貿易，興趣日益濃厚。於是在沿海中小商人與地方富紳「互惠」的動機下，雙方展開一連串的合作，使不合法的海上貿易活動無論在組織與形態上都有重大的改變。而閩南商民對海上貿易的熱烈反應，實是勢家巨族積極參與走私貿易事業的基本社會動力。

四、閩南士紳的海上走私貿易活動

嘉靖年間閩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私梟船主與中小商人引勢家富紳為奧援的情形至盛，一般來說，沿海私商與閩南鄉紳結合的目的有二：其一、向勢家大姓籌借造船與經商的巨額資本。嘉靖年間，由於走私貿易擴展至南洋一帶，大型船隻才能符合較長程海上貿易的需要，中小商人的資本不足以獨力建造大船，勢家大姓財力雄厚，與其結合，可以借得大量現金，以為造船及購貨之資本。（註三七）其二、藉鄉紳的政治地位為走私貿易之掩護。沿海商民出海貿易，進出之時只要張掛所倚鄉紳的旗號，即可逃過官府的取締（註三八）。前者是借勢家的經濟勢力為資助，後者則假鄉紳的政治勢力為奧援。這些幕後操縱海上貿易的富紳勢家，時人稱為「窩主」或「窩家」（註三九），蓋以其窩藏接濟私商之故也。嘉靖年間，沿海一帶窩引海商之徒，雖所在多有，但以閩南的漳州、泉州最盛（註四〇），且沿海各地所謂接濟之人，多係「小民勾誘番徒，窩匿異貨，其事易露，而法亦可知。漳州則多倚著姓宦族主之。」（註四一）故如欲瞭解濱海商民與窩家交通之社會經濟意義，必先探究閩南士紳的海上走私貿易活動。

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六月，巡按御史楊九澤以勢家通番，滋事招禍，而守臣不能制，且浙江寧、紹、台、溫諸府皆瀕海，界連福建福、興、泉、漳諸郡，兩省官軍不相統攝，難以制禦，疏請特命重臣巡視，盡統濱海諸郡（註四二）。七月，明廷命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紱改巡浙江，兼管福建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建寧五府海道（註四三）。朱紱受命後，首至福建閱視海防，對勢家豪紳與商民勾結之弊，深以為憂，曾指出，閩南一帶，勢豪交通私商的情形較浙江沿海更為嚴重，其「閱視海防事疏」云：

「今日交通接濟之姦豪，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為多。漳、泉之姦豪絕，則番夷不來，而溫（州）、寧（波）一帶亦可稍息。」（註四四）

「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疏」中又云：

「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註四五）又說：

「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註四六）可見朱紱所指之「姦豪」、「豪俠」，皆係指把持海上走私貿易的「衣冠之盜」而言，而「衣冠之盜」即濱海地區的勢家（註四七），亦即家貨富厚，接濟窩引私商的士大夫。

嘉靖年間，閩南士紳與濱海商民相結，不僅利用其政治權勢掩護走私商船，而且提供巨額資金，成為走私商人的合夥人，商船回航，雙方朋分利潤（註四八），這在傳統農業社會下，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現象，而閩南濱海社會的與眾不同，由此益顯而易見。朱紱於嘉靖二十六年疏論海防之弊時，除了痛陳閩南士紳交通海寇私商之害，並且不避權勢，揭露兩個泉州府同安鄉紳的姓名，他說：

「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堯，被海賊擄去一妹，因與聯姻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察閒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註四九）

明人討論嘉靖年間的海寇問題，雖不乏指出沿海鄉紳掩護商民非法貿易者，但直指勢家姓名加以抨擊，則除朱紱之外再無一人。

加以一般有關士紳生平的記載多僅及其里籍功名與宦海浮沉之個人略歷，至於其中若干士紳如何參與海上走私貿易，及其財富累積之狀況等，則並付闕如，因此本節僅能就閩南士紳之有比較具體記載者，試作個案式的探討。以下即以同安豪紳林希元爲核心，討論嘉靖年間林氏與海上走私貿易之關係。

林希元，字茂貞，一字懋貞，號次崖，泉州府同安縣人。約生於成化十六年（一四八〇），卒於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林氏於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中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執法不阿，有「鐵漢」之稱。世宗即位，條上新政八要，疏請務正學，親正人、用舊臣，清言路、急交修、持久大、息內互機務、罷內臣鎮守，世宗納其議，其後諸鎮守內臣盡罷，實林氏啟之。（註五〇）後以忤權閹江彬、大理寺卿陳琳等，謫爲泗州州判。嘉靖二年（一五二三），以巡按御史劉某無禮，遂棄官歸，居鄉三年餘。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希元以方獻夫、霍輅薦，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掌鹽政與屯政，不久改廣東提學僉事。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擢爲南京大理寺卿，十二年，改任北京大理寺。尋以大同邊軍叛殺主帥，希元連上二疏請討之，而朝議主撫，希元以忤帝旨，於嘉靖十四年謫爲廣東欽州知州。欽州接壤安南，時值安南莫登庸篡位，希元力請討之，歷陳安南可取之由，疏凡六上。尋擢廣東海北僉事，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明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威寧侯仇鸞至廣西，令希元往漳、泉等處募兵船，迨希元返粵，莫登庸已納款求和，遂罷兵。希元仍爲海北僉事，一年後，吏部考察以希元疏請討伐安南事，僭權不謹，罷歸。（註五一）時年約六十，此後將近二十年，希元終老故里，不復起用。

林希元自粵罷歸後，著述不輟，計其平生編撰有四書存疑、易經存疑、古文類鈔、大學經傳定本、荒政叢言、林次崖文集等（註五二），又與陳琛合撰易經通典、四書淺說，爲舉業所宗（註五三）。然希元之學，宗其鄉人，故於明代諸儒唯推薛瑄、胡居仁，與王守仁同時，而斥王氏傳習錄最力，其祭陽明文，但推其功業，而無一字及其學問（註五四）。希元解經，則一以朱子本義爲主，所著存疑等書，意指「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註五五），故明史與福建通志均列林氏於「儒林傳」。

林氏罷歸同安，約在嘉靖二十一年（註五六），此後開始從事海上走私貿易。希元年幼時，父林應曾以倡議執殺海寇渠首，恐其報復，而徙家內地以避禍（註五六）。希元則反其道而行，憑藉其優越的政治、社會、經濟勢力，與閩南的海商交通接引，爲其「窩主」，一方面出借資金予私商，並掩護其出入海上，一方面將運回之走私貨品轉往內地市場出售（註五八）。林氏亦

自備船隻經營海上貿易，嘉靖二十六年，朱執巡撫浙江並總督福建沿海軍務時，林希元已擁有一支龐大的船隊，以渡船爲名，實則皆用以運貨走私（註五九）。其船隊的貿易區域遠達南洋一帶，通常往返一次約半年，船隊回航後，私商須將所借資本連同利息歸還林氏，並與其朋分剩餘之所得利潤（註六〇）。林希元以此種方式經營海上貿易，從中賺得巨利，加以其居鄉士大夫的政治勢力，鄉人無不畏之，形同「土豪」（註六一）。

林希元勾結海商海寇，本爲法所嚴禁，而竟得公然出入，肆無忌憚，乃因其倚仗鄉紳之權勢挾制官府所致，朱執於「閱視海防事疏」中，言之頗詳，他說：

「考察閒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譏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夫所謂鄉官者，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狼藉如此，目中亦豈知有官府耶？」（註六二）

明代鄉官虐民之害，清人趙翼嘗論之，謂明代擺紳居鄉者，多倚勢恃強，視小民爲弱肉，上下相護，小民無所控訴（註六三），又稱守土之官如能「禁勢家之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註六四）；然則林氏在同安，不僅虐民，甚且挾官，守土之臣不能禁其欺凌小民，且反爲所制，自然只有任其公然違禁貿易，而以林氏爲「窩主」之海寇，亦因「林府」旗號之掩護而得以逃避官軍的追緝。

明人評論林希元挾制官府事，謂其「有高才而不偶于時，便以自放不爲檢束」（註六五），四庫全書集部輯有林次崖集（註六六），評林氏「氣質剛急，銳於用世」「負氣喜任事」（註六七），似認林氏罷歸後之行事，主要由其負才放誕使然。唯由明代中葉閩南社會對海上貿易的熱烈反應觀之，林氏之積極從事私販事業，亦由閩南整個社會風氣之浸染所致，據馮養虛集載：

「……漳泉惡俗，童男幼女，抵當番貨，或受其直而徑與其人，而賺得其貨，或委身而甘爲贅壻，或連姻而藉以富家，番華交通，一至此甚。……嗜利通番，今雖重以充軍處死之條，尚猶結黨成風，造舡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註六八）

可見勾結出海，違禁私販，早已蔚然成風，林希元不過爲漳泉一帶操持海上貿易的豪紳之一而已。而沿海保甲之法的崩潰，由此

亦可概見，朱紘曾疏陳閩南保甲無法實施的因果說：

「……又據月港士民嚴世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嘗行之而鮮有效者，以阻于強梁，弊于里老，且無官府以督成之，宜乎效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辦，且有強宗世襲富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得施。」（註六九）然則地方官府的無能與腐化，殆為嘉靖年間閩南沿海地區的普遍現象，在閩南人民對通番互市興趣日濃的氣氛中，豪紳或挾制官府，或勾結貪吏，給予經營海上私販極為有利的條件，輕易可置禁令於不顧，由是壟斷閩南沿海貿易之利權。

值得一提的是，林希元的窩藏接濟海商，雖經朱紘予以揭發抨擊，但明廷既未就林氏不法事展開調查或論罪，而林氏在地方社會之權勢與聲望，亦未因之消失。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年），林希元的被削籍為民，並非為違禁私貿易事，而係因林氏於前一年冬，進所編大學經傳定本、四書存疑、易經存疑，請刊布頒行學宮，世宗詔焚其書，令巡按福建御史收輸，遂以此削籍（註七〇）。林氏死後二十年，福建提學副使王世懋請祀於鄉學，建「林次崖祠」，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改祀同安文廟，以迄清代不改（註七一）。當年朱紘所攻擊的「衣冠之盜」，顯然並未因此而動搖其在「儒林」的地位，而且令名至清不衰。

五、由朱紘譖死與月港開禁看閩南士紳的影響力

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對福建海上貿易的看法與作法，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傳統派：以「貢舶貿易」為帝國馭邊政策的一環，中外互市由市舶司統制監督，嚴禁人民出海私與番商貿易，並以窮治私商為肅清沿海寇亂的根本辦法，是朝廷海禁政策的支持者，以朱紘為代表人物。第二類為投機派：利用貢舶貿易與海禁政策的限制，乘機交通沿海私商，與外國商人互市，從中獲取暴利，因而獨占民間貿易之利益，是反抗傳統海禁政策的中心勢力，朱紘所攻擊的閩省鄉紳勢豪屬之，林希元即其中之一。第三類為實用主義派：認為開放海上貿易是禁絕沿海寇亂的有效途徑，因為海禁愈嚴，私商獲利愈大，開放互市，不但可抑制私商，肅清海寇，且可使「利權在上」，朝廷收徵稅之利，於國用大有助益。故此派認為，嘉靖初年明廷罷泉州、寧波兩市舶司是一大失策，主張整頓市舶司人事，罷去主其事的貪贓宦官，而不應廢除整個市舶制度，致海上貿易之利為私商所奪。此派士大夫對違

限貿易的民間商舶，大都主張能宥其罪，而責其報官納餉，以利國用，胡宗憲、徐光啟、許孚遠均屬之。（註七二）

嘉靖時期，閩南一帶投機派知識分子活動頻繁，使海上走私貿易大為擴張，迨朱軫嚴令禁海，傳統派與投機派士大夫發生衝突，兩者對抗的結果是朱軫悲劇性的結束生命，同時也結束其徹底的海禁政策，閩省沿海軍務再弛，海寇之患猖獗如故。另一方面，成化以後發展成沿海走私貿易中心的漳州月港，由於私商薈萃，番舶往來頻繁，漸成海寇之淵藪，加以閩南人民的實際需要與實用主義派地方官的疏請開禁，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明廷將月港升格，改為漳州府海澄縣治，並於隆慶元年（一五六七）開放海禁，准人民自海澄出海貿易。本節即就朱軫譴死與月港開禁看閩南士紳的態度與影響，探析嘉靖時期傳統海禁政策遭遇之衝擊與其演變，以及投機派的閩南士紳在其間所扮演之角色。

朱軫，字子純，江蘇長洲人，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進士，有文武才，清廉峭直，勇於任事，尤惡墨吏奸豪。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七月，詔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建沿海五府軍事。到任後，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於是年連上二疏，揭發濱海勢家通番私貿及文武官員瀆職不法事。並嚴令禁海，搜捕奸民，令鄉人轉相告引，獲即斬之。朱軫令出法隨，雷厲風行，使衣食於海的閩人，驟失重利，而操持走私貿易的沿海士紳，以其海上利益大受威脅，遂深惡之（註七三）。

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四月，朱軫督官軍進攻寧波雙嶼，都司盧鑑大破海賊，俘倭人稽天及華人許棟等，又督分巡副使柯喬出海，擒渠帥三人及「真夷」六十。於是漳泉商民大恐，勢家皆懼，閩人之在朝者亦惡之。時日本貢使周良待命寧波，閩人林懋和任主客司，上言宜發回其使。軫以中國制馭外國，宜守誠信，上疏爭之，曰：「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註七四）對閩、浙勢家大肆攻擊。閩人御史周亮及給事中葉鏗乃奏請改執巡視，以削其權，吏部從之。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葡萄牙人行劫至詔安，執擊破之，擒其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以便宜斬之，其後具狀報聞，語多侵及閩南勢家豪紳。御史陳九德遂劾執擅殺。二十九年七月，兵科給事中杜汝楨及御史陳宗夔上言，執冒功坐視，縱容受賄，詔命逮執至北京鞫訊，執聞命，未逮而仰藥自盡（註七五）。

關於朱軫禁海失敗的原因，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一書已論之，本文不擬贅述（註七六）。唯朱軫致敗之由，

固與其若干措施失當有關，而閩南士紳的影響朝議，尤為癥結所在。雖因史料闕如，無法探索閩南在朝與在野士紳溝陷朱執之詳細內情，而林希元對執之被譖落職有無直接影響，亦不得而知（註七七），但朱執至閩後一再上疏攻擊閩南勢家，憤語相侵，以是結怨士紳，導致閩南勢家運用其在朝的影響力，促使閩人的言官發出反擊，則是不爭的事實。明人徐學謨謂執「嚴明介潔，遇事頗刻核」，然而「當賄賂公行之時，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沉閩人滿朝，豈宜過激，執之不終也以此。」（註七八）一語道破閩人在朝的勢力與其時政治的腐化是朱執被譖致敗的主要關鍵。

嘉靖中葉沿海倭亂之起，緣於私販與濱海勢家相結，以求庇護，勢家坐索重賄於前，要脅詐騙於後，往往侵沒貨值，商家索債不得償，遂嗾使倭人，或假倭為名，寇掠沿海以報復，海商因此變為海盜（註七九）。沿海發生寇亂之後，地方既受荼毒，勢豪亦失通番之利，因此對沿海倭亂，「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註八〇），蓋為其本身利益計，閩南勢家亦思驅盜定亂，不料執排根窮治，大搜窩主，並揭其姓名，騰之於朝，遂致閩省士紳大恐，必欲去之以維護其身家名位與既得利益。朱執仰藥自絕之前，曾有「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之語（註八一），閩浙沿海鄉紳固然是反擊朱執海禁政策的中心勢力，但彼等反對朱執的最終目的並非在促成傳統主義的海禁政策之全面廢除與民間海上貿易的全面開放（註八二），而是要恢復朱執禁海以前的原狀，在官府的妥協與縱容之下，繼續壟斷海上利益。朱執的清廉峭直，雷厲風行，使閩南勢家無所施其利誘威脅之故技，在賄賂公行、政治腐敗之際，閩南士紳對朱執的攻擊及其獲致的「勝利」，並不意味保守觀念的改變或傳統政策的廢棄，而是代表腐敗力量的勝利，這也顯示閩南士紳以其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獲致的龐大財富及傳統的政治權勢，在當代社會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註八三）。

朱執死後，海防盡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註八四），勢家舶主益無所憚，重施故技，操持玩弄於其間，卒又釀成寇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乘巨艦為水寨，分列近島，寇掠浙江沿海。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等以私販日熾，徒令勢家操持，利歸私門，先後上疏請寬海禁，盡許廣東、福建、浙江三省開通番舶，權貨徵稅，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註八五）。翌年四月，漳泉海寇又勾引倭人萬餘，流劫浙江沿海，殺擄居民，五月，攻破黃巖縣治，朝野大震（註八六），海禁於是復嚴。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倭寇」更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將洲、陳可

願爲正副使，赴日宣諭汪直，還報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胡氏開禁之議遂止（註八七）。時福建都司戴冲霄則以閩省海寇問題與浙江不同，故須「撫之得宜」，他說：

「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於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可以聊生，而海洋卽爲之肅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舶不通，米價卽貴矣，民何以存活乎？」（註八八）

戴氏乃疏請「因其勢而利導之」，其辦法爲：

「督撫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所有船隻，官爲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牌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註八九）

此議乃就閩南特殊經濟環境謀補救之道，使其與廣東、浙江維持正常的省區之間貿易，至於通番互市，則仍禁止，惜亦未爲明廷所接受。

在此期間，漳州的月港由於走私貿易繁盛，海船鱗集，濱海小民輕生競利，每有衝突，輒按劍相對，加以勾引接濟之家，陰持兩端，外交內訌，倭寇之亂最易由此起。海澄縣志載，月港倭寇之患，始於嘉靖二十八年（註九〇），此後十餘年，倭寇屢犯月港，計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三十七年五月，三十八年正月，三十八年三月、四十年正月皆遭寇亂（註九一）。地方官深以爲憂，遂有設縣之議。月港原爲漳州府龍溪縣八都九都之地，早在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巡海道河喬已疏請設縣治於月港，時因朱執督視閩海，沿海平靜一時，其事遂寢。（註九二）迨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正月，月港人張維等「二十四將」勾結倭人反，劫掠漳南諸縣，明廷遣地方官往撫。四十三年，「二十四將」復叛，巡海道周賢宣遣同知鄧士元擒斬之，而地方設縣之議再起（註九三）。明廷下閩省地方官議覆，翌年，漳州知府唐九德議將龍溪縣一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之五圖，與漳浦縣二十三都之九圖合併，立爲一縣，福建巡撫汪道昆、巡按王宗載具疏上聞，世宗下旨賜名海澄，以月港爲縣治（註九四）。月港設縣，至此終成事實。

隆慶元年（一五六七），福建巡撫塗澤民請開海禁，「易私販爲公販」，議請「止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

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註九五），明廷准其議，官府發給「由引」，許商民自海澄出海通番互市，而由海防同知徵收引稅與關稅。至此，月港由嘉靖時期的走私貿易中心一變而為海澄縣治，再變而為合法的對外貿易港口，這是十六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國與菲律賓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註九六）。直至萬曆中葉，始又因海防安全的顧慮，再度禁止通番互市（註九七）。

月港開放海禁後，貴家豪紳的海上貿易由私販轉為公販，往日獨占性的海上利益雖不復有，但仍操縱了對非的大量貿易，其中尤以硝石、硫黃、銅、鐵等軍需品的輸出，獲利最大。隆慶元年開放海禁時，原有不得將硝、磺、銅、鐵等物夾帶出海貿易的規定，但由十六、七世紀間輸入非島的貨物中有銅、鐵、鉛、錫、硝石、火藥、銅鐵及其他軍需品（註九八）來看，此類禁令並未切實執行。閩南商民藉勢家宦族之力，與沿海軍官勾結，輸出違禁貨物圖利，此為破壞前述禁令的主要原因，詔安縣志載：

「一夥豪右奸民，倚藉勢官，結納游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賣文引，載貨物出外海，逕往呂宋等夷買賣圖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註九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又載：

「沿海民大點滑及憑藉有勢力者，借東西洋由引而潛趨日本，時時有之，禁雖嚴，未全戢。」（註一〇〇）由此可見，隆慶以後，閩南勢家豪紳在合治與非法的海上貿易中，仍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六、結 論

明代中葉以後，閩南地區由於社會經濟呈現日趨嚴重的貧富不均，而農業生產又不足自給，小民求生不易，形成閩南沿海人民突破傳統農業經濟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外國商人的東來，使沿海貿易機會大增，「貿易取向」極高的閩南社會對海上利益興趣日濃，在禁愈嚴而利愈厚的趨勢下，走私貿易遂越演越盛。

嘉靖年間，閩南士紳與沿海中小商人結合，使走私貿易的規模大為擴張，士紳投注大量資金借予海商，並藉其政治與社會勢

力，掩護走私商船，從中獲取暴利。在朱執兼攝閩浙沿海軍務期間，這些投機士紳受到朱執的猛烈抨擊，衣食於海的閩省商民，既恐嚴行海禁而斷其生計，富紳勢家尤不願驟失其海上貿易之利，士紳遂利用福建在朝士大夫的影響力，不斷反擊朱執，終使朱納受譴自絕，因此在「投機派」士大夫對抗「傳統派」士大夫的過程中，閩南士紳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十六世紀閩南一帶海上貿易的發達，使沿海州縣與內地各府經濟形態的差別愈來愈大，當內地州縣經濟發展近乎停滯之際，濱海地區因與日、葡、西各國商人貿易，商業繁榮，經濟發展迅速，閩南的漳州府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註一〇一）。漳州的月港因海上貿易興盛，發展更為迅速，月港的繁榮是民間貿易發達的具體象徵，而嘉靖四十四年月港的升格為縣，更是這個走私貿易中心快速發展迫使明廷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的明證。閩南士紳投身海上貿易，無非以追逐個人私利為動機，由傳統道德標準觀之，彼等蔑視朝廷法令與地方官府，難免貪利壞法、士夫無節之議；唯若就促進閩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言，士紳的積極從事海上貿易，亦未嘗不是促成漳州一帶民間貿易繁盛的力量之一，對十六世紀閩南社會經濟之變遷，應不無正面之意義。

整體而言，明代的財政制度非常僵硬，財政機構的運作能力愈來愈低，既忽視從工商業資源開發稅收，也不考慮從私人尋求財政支助的可能性（註一〇二）。明代囿於祖制，對海禁政策的堅持不肯變易，漠視了閩南社會的實際需要與開放海上貿易的必然趨勢，其政策的缺乏彈性，由此亦顯而易見。閩南社會，士庶無不重商，明廷未能因勢利導，既不及早開放海禁，使濱海小民藉海上通市獲得衣食所需，以爲解決地方民生的根本之道；又未能善用閩南勢家豪紳的雄厚財力與私商船主的積極冒險精神，爲國家財政試闢新徑。嘉靖年間，閩南士紳的窩引接濟私商，使民間貿易在非法狀態下無法健全的發展，迨隆慶元年雖開放海禁，但行之三十年即罷，明廷終無積極的政策除其積弊，這對中央財政與地方發展，皆未嘗不爲憾事。

附註

註 一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指出：當時所稱「倭夷」，夷人僅占十分之一，其實多爲明朝編戶之民。見明世宗實錄，卷四二二，頁二下。

- 註二 談遷撰，國榷（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鼎文書局，台北），卷五九，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條，總頁三七三六。
- 註三 詳見吳曉，「胡惟庸黨案考」，燕京學報第十五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出版，民國六十一年東方文化書局復刊），頁一九三至一九九，明初之倭寇與中日交涉。
- 註四 明律集解附例（民國五十八年二月，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四年重刊本影印），卷十五，兵律，頁一二上下，「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條。
- 註五 明史（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鼎文書局，新校本），卷八十一，食貨志五，市舶，總頁一九八〇。
- 註六 會同館是一個總驛站，也是接待貢使人員之處。明代會同館有兩處：洪武初年，以南京公館為會同館。永樂北遷後，又在北京設立一個會同館，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定為南北館。有關會同館及其開市，參閱張德昌，「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見明代國際貿易（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台灣學生書局，明史論叢之九），頁一三至一四。
- 註七 詳見內田直作著，王懷中譯，「明代的朝貢貿易制度」，明代國際貿易，頁六一至七〇。
- 註八 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上冊（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台北南港），頁三七七。
- 註九 陳文石，前揭文，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上冊，頁三八二。
- 註一〇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三民書局），卷五十五，沿海倭亂，總頁五八八。
- 註一一 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上冊，頁三八三至三八四，陳文石，前揭文。
- 註一二 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上冊，頁三八八。
- 註一三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叢書，台灣商務印書館），原編第廿六冊，福建，頁八四上。
- 註一四 胡宗憲，籌海圖篇（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卷四，福建事宜，頁二八下。
- 註一五 清、懷蔭布重修，黃任等纂，泉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八年據同治九年重刊本修，民國十七年泉州泉山書社再版），卷二十，風俗，頁四上。
- 註一六 泉州府志，卷十九，物產，頁一上。
- 註一七 謝肇淛，五雜俎（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偉文圖書公司，秘笈叢編），卷四，地部二，總頁一〇三。
- 註一八 詳見明憲宗實錄，卷二一〇，頁三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鏞奏。
- 註一九 泉州府志，卷二十，風俗，頁一三下，引「溫陵舊事」。
- 註二〇 五雜俎，卷四，地部二，頁一〇二。

- 註 二一 劉翠溶，「明清時代南方地區的专业生產」，大陸雜誌，五十六卷三、四期合刊（民國六十七年五月），頁二七。
- 註 二二 參閱劉翠溶前揭文，大陸雜誌五十六卷三、四期合刊，頁三九：芋麻，頁四〇：藍靛，頁四三：煙草，頁四六至四七：甘蔗。
- 註 二三 荔枝以興化府福寧縣為最，長樂縣次之，柑橘以漳州府為最，福州次之。見明、王世懋撰，閩部疏（民國六十四年六月，成文出版社據明實錄堂訂正刊本影印），頁二〇。閩省大量栽培荔枝龍眼，目的在作為貨品出售，據周亮工，閩小記（民國六十四年六月，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刊龍威秘書本影印），閩中有「養荔」之俗：「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貨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栽。有養花者，穠孕者，樹主與穠者情價估鄉老為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難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培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穠家囑少。」（閩小記，頁二八）。
- 註 二四 Ng Chir-Keong（吳振強），「A Study on the Peasant Society of South Fukien, 1506-1644」,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Vol. VI, 1972, p. 210.
- 註 二五 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經濟史論叢（一九七二年八月，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第一冊，頁四三五。
- 註 二六 Ng Chir-Keong, "A Study on the Peasant Society of South Fukien, 1506-1644,"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Vol. VI, 1972, p. 109
- 註 二七 同前，頁二一〇。
- 註 二八 明世宗實錄，卷四二二，頁二下：「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 註 二九 朱執，朱中丞鑒餘集，卷一，頁五上，「閱視海防事疏」，見徐孚遠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國聯圖書出版公司據明崇禎年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卷二〇五，頁五上。
- 註 三〇 姜宸英，「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稿」，見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出版社影印），卷八三，兵政十四，海防，頁九上（總頁二九五五）。
- 註 三一 陳鎮等修，鄧廷祚等纂，海澄縣志（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卷十五，風土志，頁一至二。
- 註 三二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總頁八四三三。
- 註 三三 Ng Chir-Keong, "Gentry-Merchants and Peasant Peddlers — The Response of the South Fukienese to the Offshore Trading Opportunities, 1522-1566,"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Vol. VII, 1973, p. 163.
- 註 三四 王世懋，閩部疏，頁四九（原編頁十三上）。
- 註 三五 張燮，東西洋考（民國五十一年，正中書局影印），卷七，餉稅考，頁一。

- 註 三六 參閱：片山誠二郎，「明代海上密貿易と沿海地方郷紳層」，歷史學研究，第一六四號（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日本岩波書店印），頁二四。
- 註 三七 參閱：片山誠二郎，前揭文，頁二五。另海澄縣志，卷十五，頁一：「富家以財，貧人以驅」，亦可解釋閩南勢豪與小民結合的形態。
- 註 三八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四，福建事宜，頁三一下。
- 註 三九 朱中丞覽餘集，卷一，頁八下，見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八下。
- 註 四〇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四，福建事宜，頁三一下，引閩縣知縣仇俊卿語。
- 註 四一 同前註。
- 註 四二 明世宗實錄，卷三二四，頁七上至七下。
- 註 四三 明世宗實錄，卷三二五，頁二上。
- 註 四四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六上，朱執，「閱視海防事疏」。
- 註 四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三下，朱執，「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疏」。
- 註 四六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四至五四〇五。
- 註 四七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三：「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
- 註 四八 片山誠二郎，前揭文，頁二五。
- 註 四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七上至七下，朱執，「閱視海防事疏」。
- 註 五〇 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華文書局據清同治十年重刊本影印，中國省志彙編之九），卷二一二，人物志，明儒林傳，林希元，頁三八至三九。
- 註 五一 福建通志，卷二一二，人物志，明儒林傳，頁四一至四三。
- 註 五二 Bodo Wiethoff, "Biography of Lin Hsi-yuan", in 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21.
- 註 五三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蔡清傳附，頁七二三五。
- 註 五四 四庫全書總目（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四版，藝文印書館影印），卷一七六，集部二十九，頁五七。
- 註 五五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經部五，頁五，引洪朝選序。
- 註 五六 福建通志，卷二一二，頁四三。

- 註 五七 福建通志，卷二一二，頁三七至三八。
- 註 五八 Bodo Wiethoff, p. 921.
- 註 五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七下，朱執，「閱視海防事疏」。
- 註 六〇 即扣除資本之本息後之收入，見 Bodo Wiethoff, p. 922.
- 註 六一 同前註。
- 註 六二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七上至七下，朱執，「閱視海防事疏」。
- 註 六三 趙翼，廿二史劄記（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四版，世界書局），卷三十四，「明鄉官虐民之害」，頁四九五。
- 註 六四 同前書，頁四九六。
- 註 六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七上，徐孚遠等所加按語。
- 註 六六 林氏文集共十八卷，全本末見，皇明經世文編卷一六二至一六五輯有林次崖集，僅四卷，由於集中林氏未有述及其參與海上貿易之文字，故本文未能由林次崖集引證資料解釋本節所討論之問題。
- 註 六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六，頁五六與五八。
- 註 六八 馮璋，馮養虛集，卷一，「通番船議」，皇明經世文編，卷二八〇，頁一八下至一九上。
- 註 六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〇五，頁八下。
- 註 七〇 福建通志，卷二一二，頁四三。
- 註 七一 林學增等修，吳錫璜纂，同安縣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卷十四，學校，附祠宇，頁一〇下。
- 註 七二 Half of the Ming Period—Government Policy and Elite Groups' Attitudes,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Vol. V, pp. 81-100. 作者根據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對福建海上貿易的不同態度分為三群 elite groups: the traditionalists, the profiteers, the pragmatists.
- 註 七三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三至五四〇四。
- 註 七四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四至五四〇五。
- 註 七五 以上經過詳見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四至五四〇五。
- 註 七六 朱執禁海失敗的原因，詳見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二十，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初版），頁一四七至一四八。

- 註七七 Bodo Wiethof, p. 922.
- 註七八 國權，卷五九，嘉靖二十七年六月，頁三七一八，引徐學謨語。
- 註七九 詳見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上冊，頁三八八至三九〇，陳文石，前揭文。
- 註八〇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頁五八九。
- 註八一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五。
- 註八二 片山誠二郎，頁三〇。
- 註八三 Ng Chin-Keong,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Vol. V, p. 92.
- 註八四 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傳，頁五四〇五。
- 註八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頁五九〇，皇明經世文編，卷二八〇，馮養虛集，卷一，頁一六上下，「通番舶議」。
- 註八六 明世宗實錄，卷三八四，頁五上，嘉靖三十一年四月。
- 註八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頁五九九。
- 註八八 籌海圖編，卷四，福建事宜，頁三三上至三三下。
- 註八九 同前書，卷四，福建事宜，頁三四上。
- 註九〇 海澄縣志，卷十八，災祥志：寇亂，頁一〇。
- 註九一 詳見海澄縣志，卷十八，災祥志：寇亂，頁一〇至一一。
- 註九二 海澄縣志，卷一，輿地志：建置，頁一。
- 註九三 月港張維等二十四人之叛，即「二十四將之亂」，起因於張維等人造舟接日本商舶，巡海道邵懷發兵剿捕，張維等拒之，遂反。詳見海澄縣志，卷十八，災祥志：寇亂，頁一一至一二。
- 註九四 海澄縣志，卷一，輿地志：建置，頁一。
- 註九五 許孚遠，敬和堂集，見皇明經世文編，卷四〇〇，頁四上至四下，「疏通海禁疏」。
- 註九六 據全漢昇先生的研究，十六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菲之間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有：(1)白銀在太平洋東西兩岸供求情況的不同，(2)明廷對國外貿易管制的放寬，(3)統治菲島的西班牙人對中國貨物的依賴。詳見：中國經濟史論叢，頁四一九至四二六，「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
- 註九七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〇〇，頁二上，許孚遠，「疏通海禁疏」。
- 註九八 陳荆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一九六三年，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頁五六。

註九 詔安縣志，卷十二，頁一三下至一四上，沈鐵，「上南撫臺經營澎湖六策書」。

註一〇 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冊，福建，頁一〇四上。

註一一 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Hunan and Fuki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7—100, ch. 4 "Market Stimulus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Case of Fukien".

註一二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21.